



丛书主编/任定成

国科大 文丛 |

多重视角下的 新闻传播

诸葛蔚东 张增一 ● 编



科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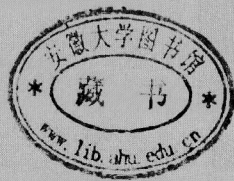


国科大文丛 |

丛书主编/任定成

多重视角下的新闻传播

诸葛蔚东 张增一◎ 编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多重视角下的新闻传播/诸葛蔚东, 张增一编.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3. 3

(国科大文丛)

ISBN 978-7-03-037000-6

I. ①多… II. ①诸…②张… III. ①新闻学-传播学-文集
IV. ①G21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45426 号

丛书策划: 胡升华 侯俊琳

责任编辑: 牛 玲 闵敬淞/责任校对: 钟 洋

责任印制: 赵德静/封面设计: 黄华斌

编辑部电话: 010-64035853

E-mail: houjunlin@mail.sciencep.com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 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骏立印刷厂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3 年 4 月第 一 版 开本: B5 (720×1000)

2013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18 1/2

字数: 293 000

定价: 74.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国科大文丛

顾问

郑必坚 邓 勇 李伯聪
李顺德 王昌燧 佐佐木力

编委会

主 编 任定成

副主编 王大洲 张增一 诸葛蔚东

编 委 (以姓氏拼音为序)

方晓阳	胡新和	胡耀武
胡志强	刘铁军	马石庄
孟建伟	任定成	尚智丛
王大洲	肖显静	闫文军
叶中华	张增一	诸葛蔚东

丛书弁言

“国科大文丛”是在中国科学院大学和中国科学院研究生教育基金会的支持下，由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策划和编辑的一套关于科学、人文与社会的丛书。

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及其前身的学者和他们在院内外指导的学生完成了大量研究工作，出版了数百种学术著作和译著，完成了数百篇研究报告，发表了数以千计的学术论文和译文。

首辑“国科大文丛”所包含的十余种文集，是从上述文章中选取的，以个人专辑和研究领域专辑两种形式分册出版。收入文集的文章，有原始研究论文，有社会思潮评论和学术趋势分析，也有专业性的实务思考和体会。这些文章，有的对国家发展战略和社会生活产生过重要影响，有的对学术发展和知识传承起过积极作用，有的只是对某个学术问题或社会问题的一孔之见。文章的作者，有已蜚声学界的前辈学者，有正在前沿探索的学术中坚，也有崭露头角的后起新锐。文章或成文于半

个世纪之前，或刚刚面世不久。首辑“国科大文丛”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的历史和现状。

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的历史可以追溯至1956年于光远先生倡导成立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自然辩证法研究组。1962年，研究组联合北京大学哲学系开始招收和培养研究生。1977年，于光远先生领衔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北京）建立了自然辩证法教研室，次年开始招收和培养研究生。

1984年，自然辩证法教研室更名为自然辩证法教学部。1991年，自然辩证法教学部更名为人文与社会科学教学部。2001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北京）更名为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教学部随之更名为社会科学系，并与外语系和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一起，组成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2002年，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更名为人文学院，之后逐步形成了包括科学哲学与科学社会学系、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新闻与科学传播系、法律与知识产权系、公共管理与科技政策系、体育教研室和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在内的五系一室一刊的建制。

2012年6月，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更名为中国科学院大学。现在，中国科学院大学已经建立了哲学和科学技术史两个学科的博士后流动站，拥有科学技术哲学和科学技术史两个学科专业的博士学位授予权，以及哲学、科学技术史、新闻传播学、法学、公共管理五个学科的硕士学位授予权。

从自然辩证法研究组到人文学院的历史变迁，大致能够在首辑“国科大文丛”的主题分布上得到体现。

首辑“国科大文丛”涉及最多的主题是自然科学哲学问题、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科技发展战略与政策、科学思想史。这四个主题是中国学术界最初在“自然辩证法”的名称下开展研究的领域，也是自然辩证法研究组成立至今，我院师生持续关注、学术积累最多的领域。我院学术前辈在这些领域曾经执全国学界之牛耳。

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经济学是改革开放之初开始在我国复兴并引起广泛关注的领域，首辑“国科大文丛”中涉及的这四个主题反映了自然辩证法教研室自成立以来所投入的精力。我院前辈学者和现在仍活跃在前沿的学术带头人，曾经与兄弟院校的同道一起，为推进这四个领

域在我国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努力。

人文学院成立以来，郑必坚院长在国家发展战略方面提出了“中国和平崛起”的命题，我院学者倡导开辟工程哲学和跨学科工程研究领域并构造了对象框架，我院师生在科技考古和传统科技文化研究中解决了一些学术难题。这四个主题的研究也反映在首辑“国科大文丛”之中。

近些年来，我们在“科学技术与社会”领域的工作基础上，组建团队逐步在科技新闻传播、科技法学、公共管理与科技政策三个领域开展工作，有关研究结果在首辑“国科大文丛”中均有反映。学校体育研究方面，我们也有一些工作发表在国内学术刊物和国际学术会议上，我们期待着这方面的工作成果能够反映在后续“国科大文丛”之中。

从首辑“国科大文丛”选题可以看出，目前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实际上是一个发展中的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我们的科学哲学、科学技术史、科技新闻、科技考古，是与传统文史哲领域相关的人文学。我们的科技传播、科技法学、公共管理与科技政策，是属于传播学、法学和管理学范畴的社会科学。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在若干个亚学科和交叉学科领域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优势。

健全的大学应当有功底厚实、队伍精干的文学、史学、哲学等基础人文学科，以及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和法学等基础社会科学。适度的基础人文社会科学群的存在，不仅可以使已有人文社会科学亚学科和交叉学科的优势更加持久，而且可以把人文社会科学素养教育自然而然地融入理工科大学的人文氛围建设之中。从学理上持续探索人类价值、不懈追求社会公平，并在这样的探索和追求中传承学术、培养人才、传播理念、引领社会，是大学为当下社会和人类未来所要担当的责任。

首辑“国科大文丛”的出版，是人文学院成立10周年、自然辩证法教研室建立35周年、自然辩证法组成立56周年的一次学术总结，是人文学院在这个特殊的时刻奉献给学术界、教育界和读书界的心智，也是我院师生沿着学术研究之路继续前行的起点。

随着学术新人的成长和学科构架的完善，“国科大文丛”还将收入我院师生的个人专著和译著，选题范围还将涉及更多领域，尤其是基础人文学和社会科学领域。我们也将以开放的态度，欢迎我院更多师生和校友提供书

稿，欢迎国内外同行的批评和建议，欢迎相关基金对这套丛书的后续支持。

我们也借首辑“国科大文丛”出版的机会，向中国科学院大学领导、中国科学院研究生教育基金会、我院前辈学者、“国科大文丛”编者和作者、科学出版社的编辑，表示衷心的感谢。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appearing to read '何震' (He Zhen), written in a cursive style.

2012年12月30日

序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多重视角下的新闻传播》，是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师生在新闻传播学领域所做的部分工作。

新闻传播学是个多学科交叉的领域，在这个领域采用多维度的研究视角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文学、史学、哲学、人类学、宗教学、语言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神经科学、认知科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在新闻传播学领域都有用武之地。不过，每位学者甚至每个学术机构的研究，都只能在一个或者若干个方面形成自己的特色或者优势。

近些年，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的学者在新闻传播学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对科学划界标准在美国当代立法实践中的传播研究。当今世界，美国是超级科学强国。但在这样一个国度，许多州的法律居然禁止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传播，上帝造人的学说却被当作科学学说纳入初等教育内容之中。这一现象虽然引

起科学界和教育界的抗争，但最终却是由民间人权组织诉诸立法过程，才逐步得到改变。与此有关的原始文献汗牛充栋，相关的学术研究也是不计其数。张增一教授具有科学和哲学的教育背景，在荷兰从事过科学、宗教与社会的研究，在美国从事过公众理解科学的研究。他利用自己的学术优势，从科学划界标准的传播这一独特视角，去分析和把握进化论与创始论的百年之争，为我们理解科学观在立法实践中的传播开启了一条富有成效的渠道。

第二是对日本媒介与社会变迁及其与中国关系的研究。最早的新闻史著作出现于19世纪中叶的德国，新闻学的建制化始于20世纪初的美国；而在东亚，“新闻学”这一概念最早出现于日本。传播学诞生于20世纪的美国和欧洲，但是，中国学界真正明白“大众传播”的理念，却始于日本学者内川芳美来华演讲。日本的新闻传播学有其特点，部分源自其新闻传播实践。诸葛蔚东教授具有日本社会学和中国传播学的双重教育背景，他利用自己的优势主持或参与了多项欧美和日本国际合作项目，出版了《媒介与社会变迁》、《战后日本舆论、学界与中国》、《现代传媒史》、《新闻学关键概念》等书。

第三是对中国科学传播现象和科学传播政策的研究。公民科学素养状况，是制订科学传播政策的依据。1957年，美国学者率先进行公民科学素养调查。借鉴米勒（Jon D. Miller）教授的调查框架，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在1989年组织开展了中国公民科学素养的试调查工作，从1992年起开始较为定期地开展正式调查。李大光教授在中国科普研究所工作有年，他受中国科普研究所委托，5次负责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调查的结果，受到国际科学界的注意，也为我国制订相关政策提供了参考。结合调查，他对国外关于科学素养调查的研究和问卷内容做了系统的梳理。李志红副教授的兴趣领域是政策分析，她曾经与其学生一起，梳理了我国科技规划中的科普政策。受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和科学技术部的委托，我和我的小组有幸参与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制定工作的研究活动，梳理国内外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内容，研究公民科学素养标准，为相关决策提供了学术支持。

第四是对科学传播案例和实际工作的研究。这类工作为我国科学技术协会系统所重视。我院参加此类研究的学者较多，其中莫扬和詹琰两位副教授分别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和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的资助下，做了较为系统的工作。1983年，拉图尔（Bruno Latour）提交名为“可视化与认知：用眼手

思维”的经典论文以来，科学实践中的可视表征成为科学知识社会学和科学传播领域倍受关注的现象。詹琰副教授在俄罗斯接受的是美术史教育，她以自己的背景优势，分析了一些科普刊物的视觉传播特征和效果，并给出了自己的建议。近些年国内一些学校开展科学传播专业教育。莫扬副教授具有师范大学的教育背景，也有媒体工作的经历，她对国内外高校科技传播专业和科技博物馆教育的现状做了案例分析，也对我国今后的发展提出了建议。张增一教授近年承担了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的一些研究项目，对麻省理工学院的科技传播等案例也做了分析。此外，科技共同体内部的交流，也成为国内近些年关注的研究对象。王大明教授带领他的学生对《细胞》(Cell) 期刊8年当中载文、作者与被引情况做了计量学描述；李志红副教授和她的学生对9种国内科学学期刊10年的资料做了计量学处理。他们的工作为我国科技期刊的发展提供了借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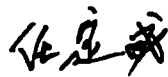
第五是科技传播史的研究。这类工作往往与科技史研究密切相关。方晓阳教授研究传媒技术史多年，结合文献考证和模拟实验手段，对中国印刷史、造纸史和制墨史方面的许多问题开展了研究。佐佐木力教授在普林斯顿大学和东京大学期间，对笛卡儿(René Descartes)的数学思想及其传播进行了长达数十年的研究，他也因此作为笛卡儿研究学者为国际学术界所熟知。来中国科学院大学任教后，他又期待将他的老师托马斯·库恩(Thomas Samuel Kuhn)“历史的科学哲学”扩展到研究中国和东亚的科学传播上，目前他正在指导研究生开展工作。张增一教授对传播学的研究是从传播史开始的，他在16年前就对江南制造局的译书活动进行了研究。我的学生也曾独立地研究过中国针刺麻醉向美国传播的历史，以及宋代医学知识的扩散。

此外，北京大学王异虹副教授在德国攻读博士学位和在中国科学院大学任教期间，曾对跨文化传播做过研究。胥琳佳博士对新媒体与网络舆情和品牌传播也做了研究。

我在这篇序言中没有对本书进行介绍，因为本书结构和内容从目录就能够一目了然。我介绍上述情况的目的，是为了帮助读者更好地了解本书的背景，也是希望读者在阅读本书之余能够关注本书中没有包含、我在前面提及的研究工作。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新闻传播学科是一个年轻的学科。我们已经取得了一些成绩，形成了一定的学术优势。我们的新闻传播学科将在

发挥既有优势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基础理论、研究方法、新兴领域、新媒体和新手段的研究。我期待着本书的读者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批评和建议，关注并支持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新闻传播学科的发展。

在本书出版之际，我要代表学院感谢中国科学院大学领导对这一学科的支持，感谢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从事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师生，感谢本书的作者和编者，最后还要预先感谢本书的各位读者！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appearing to read '何定' (He Ding), written in a cursive style.

2013年2月20日

目录

丛书弁言 / i

序 / v

第一部

国际视角

公民科研：构筑民主生活与科技创新相结合的新平台 / 003

国际科学素养研究与问卷修改的争论 / 009

英国科学家和工程师对科学传播的影响调查 / 020

把科技传播给公众：MIT 案例分析 / 031

日本出版走向海外的途径分析 / 044

出版创新与文化软实力的兴起 / 053

中美科技类博物馆科学传播的若干对比研究 / 064

针刺麻醉向美国传播的若干史实的考证 / 077

第二部

传播者

江南制造局的译书活动 / 091

新闻学校：德国记者培训的特色及启示	/ 101
哥伦比亚大学怎样培养实用科技新闻人才	/ 108
我国高校科技传播专业建设现状分析及建议	/ 115
中国历次科技规划中的科普政策	/ 123
转基因技术在美国和欧洲的认知及传播	/ 130

第三部

视觉传播

本土科普期刊与引进版科普期刊图片类型的差异性研究 ——以《知识就是力量》等四种科普期刊为例	/ 145
中国科普期刊视觉效果分析	/ 158
虚拟空间中的“读图时代” ——技术引发的美学变革	/ 165
从视觉文化论太空美术与科学传播	/ 177

第四部

科学与公众

科学素质概念的演变	/ 189
美国公民科学技术素质标准的设立和演变	/ 198
“公众理解科学”进入中国 15 年回顾与思考	/ 223
科学家对自身参与科学传播活动看法的调查研究	/ 235
工程传播是传播学研究的新对象和新内容	/ 245
科研机构向公众开放活动中的问题研究 ——以中国科学院为例	/ 260

主题索引	/ 272
作者简介	/ 275

第一部
国际视角

公民科研： 构筑民主生活与科技创新相结合的新平台^{*}

近几年，我国在政治生活、文化建设、科技创新、公民素质提升等方面，相继地构想、设计、实施了一些新的措施。在政治生活中，正在试验的基础上推进民主建设^[1~3]；在文化建设方面，进行了大规模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4,5]；在科技创新方面，提出了中长期规划^[6]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7]；在提升公民素质方面，制定了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8]。

这些构想和措施设计之间有必然的联系。为使这些举措之间的联系更密切，笔者在这里提出建议：在我国设立一项新的计划，即公民科研，以此作为一个落实上述各项计划的有效交接地带。

公民科研可以使参与者的科学素质大幅提高，使公共事务的讨论建立在得到公众认可的科学研究基础之上，使科技创新成为有公众直接参与支持的事业，使文化建设的情感诉求得以与理性诉求相配合，使民主决策得到有公众和科学家共同提供的科学研究结果的支持。

一、什么是公民科研

从字面上讲，公民科研就是公民参加的科研活动，与之对应的英文就是

^{*} 本文作者为任定成，原载《贵州社会科学》，2008年第8期，第16~18页。